

致願格曼博士書信集

卡爾·馬克斯 作
天 藍 譯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目次

前言	馬·恩·列寧院作	5
馬克思致顧格曼通信集俄譯本序言	L. I. 列寧作	7
致 L. 顧格曼博士書信	K. 馬克思作	17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廿八日信		19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信		22
一八六五年二月廿三日信		23
一八六六年正月十五日信		24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信		31
一八六六年八月廿三日信		33
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信		35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信		38
一八六六年十月廿五日信		40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信		41
(馬克思致北德意志報編輯信，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41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信		42
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信		44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信		45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信		48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卅日信		50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信		51
(J. 狄茨根致馬克思信，一八六七年十月廿四日)		51
一八六八年正月十一日信		55
一八六八年正月卅日信		57

(給K. 克邊尼的履歷表)	5 9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信	6 1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信	6 3
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信	6 5
(F. 弗萊立格拉斯給馬克思信，一八六八年四月三日)	6 7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信	6 9
一八六八年六月廿四日信	7 0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信	7 1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信	7 2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信	7 5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信	7 6
一八六八年十月廿六日信	7 8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信	7 9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信	8 2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一日信	8 3
(A. 盧格致史吞達信，一八六九年正月廿五日)	8 5
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信	8 7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一日信	9 0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信	9 1
一八六九年七月卅日信	9 2
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二日信	9 3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信	9 4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信	9 7
一八七〇年三月廿六日信	1 0 0
一八七〇年三月廿八日信	1 0 1
(倫敦總會給布龍斯維克委員會的秘密情報 一八七〇年正月十六日)	1 1 1
一八七〇年六月廿七日信	1 1 4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信.....	1 1 6
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信.....	1 1 7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信.....	1 2 0
(馬克思給「每日新聞」信，一八七一年正月十六日) ...	1 2 3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信.....	1 2 6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信.....	1 2 8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八日信.....	1 2 9
(馬克思給「東報」信)	1 3 0
一八七一年七月廿七日信.....	1 3 2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九日信.....	1 3 3
一八七二年七月九日信.....	1 3 4
一八七二年七月廿三日信.....	1 3 5
一八七二年七月廿九日信.....	1 3 6
一八七二年八月廿六日信.....	1 3 7
一八七四年正月十九日信.....	1 3 8
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信.....	1 3 9
一八七四年六月廿四日信.....	1 4 1
一八七四年八月四日信.....	1 4 2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日信.....	1 4 3

SWT/596/08

前 言

這是馬克思致顧格曼的書信集第一次地以英語本問世，譯文以原信爲藍本。全集存於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

收信人勒·顧格曼博士（一八三〇——一九〇二）是一個外科兼婦科醫生，在漢諾威開有一個大診所；年青的時候，他參加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而終生都自視爲馬克思底熱烈的信徒。他研究馬克思底「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五〇）後，即希望結識馬克思。一八六二年經由德國詩人佛萊立格拉斯底幫助，他如願以償了。佛萊立格拉斯那時是一個政治流亡者，住在倫敦。認識是以通訊（請閱本集第一信）開始的，但很快就成熟爲相契的友誼，通訊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顧格曼是能够給馬克思以某些寶貴的幫助的，使他知道德國的情況，替「資本論」找出版者。他是第一國際底會員，曾作爲代表出席過盧森尼大會（一八六七）和海牙大會（一八七二）。

一八七四年，當馬克思和顧格曼同在卡爾斯巴德的時候，他們的友情關係終止了。雖然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顧格曼是不會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或充分把握到馬克思學說底實質的。欽羨甚至崇拜馬克思這個思想家，這個科學和天才的偉人，顧格曼却不能和革命的馬克思，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袖和組織者一致。雖然是社會主義終必勝利底誠懇的信仰者，他拒絕無產階級鬥爭而企圖以純粹改良主義的道路來實現他的理想。顧格曼底這些觀點不能不引向他們彼此間的疏遠以致決裂。

可是決裂以後，顧格曼繼續對馬克思表示「崇敬」，不斷的問道馬克思和他的家屬和恩格斯，同時繼續宣傳「資本論」，他珍視馬克思底書信爲「畢生最大的驕傲」，並且籲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

在他死後把它們出版。

一九〇二年，考茨基把信在「新時代」上發表了，那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刊，論述巴黎公社的兩封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十七）引起列寧特別的注意，並從事於把這些信件在俄國出版。在一九〇七年列寧所寫的本書的序言中，他特別指出那些信件，並把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革命的態度和普列汗諾夫對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義的機會主義者怯懦的態度對比起來。

考茨基編印這些信件時曾因私人的緣故刪削了好幾段，可是那對於馬克思生活的研究却是有很大的價值的，此外，由於機會主義者的顧慮，他完全扣壓了那封一八六五年二月廿三日的信，即本集的第三封信，信中對拉沙爾和一般所謂「現實政治」的機會主義作了極端嚴酷的批評，馬克思把它作為一個反動的陰謀政策來暴露，它只是把「鼻子跟前的利益」看成「現實」，「可是事情的實質却在於無產階級必須忠誠於革命。」一九〇七年列寧寫本書的序言時還不知道有這封信。

馬一恩—列學院。

序 言

——爲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的俄文譯本而作——

V. I. 列 寧

我們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新時代週刊所發表的馬克思致顧格曼的書信全集印成單行本問世，其目的就在於使俄國的公衆更切近地熟悉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正如衆所週知的，馬克思花費很大一部份時間來作私人事情的通信。這個材料對於作傳記的人是非常有價值的，可是對於一般的公衆，特別是俄國的工人階級，那些含有理論性和政治性的材料的章句却更感着莫大的興趣，正當我們目前革命的時代，仔細地研究這些材料，對於我們是有着特別重要的教育意義的，這些材料顯示了馬克思這個人直接回答了有關工人運動和世界政治的一切問題。新時代的編輯這樣說是很對的，「我們由於熟習這樣一些人們的人格而被鼓舞着——他們的思想和意志是在嚴重的革命高潮的情況下形成起來的。」對於一九〇七年俄國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熟悉這種材料是加倍地必要的：因爲它給有關的許多的直接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指示的寶藏，那些問題正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國家內所經歷的一切和每一個革命中所遇着的問題。現在，俄國正在經歷着一個「偉大的革命的高漲」。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相對的暴風雨時期所追求的政策應該常常作爲社會民主黨人在俄國現時革命中所追求的政策榜樣。

因此，我們將馬克思通信中在理論觀點上認爲特別重要的章句簡短地摘註出來，同時，把他作爲無產階級的代表，來更詳盡地討論他的革命的政策。

從對於馬克思主義能作較充分的和深刻的說明這觀點上來看，具有特出的意義的要算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的那封信。這封信上，馬

克思用反對庸俗經濟學者的辯論語句的形式，非常清晰地闡明了他所謂的「勞動」價值論。對於受資本論教育較淺的讀者心中所自然提出的那些非難——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為「教授式的」資產階級的「科學」的庸俗代表們所急於抓住的非難——馬克思作了異樣簡明的分析和解說，其中他說明了他所進行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每一個人要達到闡明價值論所必須進行的方法。舉出許多最普通的非難的例子，他教給了我們他的方法，他說明了像價值論這樣純粹（好像是）理論性的抽象的問題和「統治階級利害」之間的關係，而統治階級總是需要「繼續混亂的」。我們希望每一個開始研究馬克思和讀他的資本論的人能一讀再讀這封信，當他讀着資本論第一章和較為困難的那幾章的時候。

信中其它有關理論的部份就是馬克思對各個不同的作家的估計的那些部份，馬克思這些意見寫得非常生動，充滿着熱情，表示一種對所有偉大思潮無所不包的並分析這些思潮的興趣，讀着這些意見，一個人就覺着好像是在聽着一個天才的思想家說話。除他偶爾對狄茨根的意見之外，那些對於普魯東派的意見值得讀者特別的注意。資產階級「英俊」的知識青年，在「社會革命高漲」的時期，投到「無產階級之中」來，他是無法接受工人階級的觀點的，同時也無法在無產階級「隊伍」的組織中進行堅苦的工作的——這些都被馬克思特異生動的筆觸所描畫清楚了。

這裏我們也有着關於杜林的意見，它好像是在預期着九年以後恩格斯所寫的「反杜林論」（和馬克思合作寫的）似的，這本書有齊得博的俄譯本，可惜遺漏和錯誤的地方太多，簡直是一個壞譯本。這裏同時也看見了關於杜林的意見，同時涉及到里嘉圖的地租論。早在一八六八年，馬克思就着重指斥過「里嘉圖的錯誤」，這些錯誤他終於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給駁斥了。可是直到今天修正主義者——從我們超資產階級的甚至「黑色百人團」的布爾加可夫先生到「差不多正宗的」馬司洛夫——都在重複這些錯誤。

同樣有意義的就是馬克思對布希勒的意見和他對庸俗唯物論以及從朗奇（一般「教授式」資產階級哲學的泉源！）那裏抄來的「淺薄的胡說」的估價。

現在我們就談到馬克思的革命的 policy，在俄國，有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社會民主黨中奇異地廣泛流行着，這種觀點認為具有特別形式鬥爭和特殊無產階級問題的革命時期是一個例外，而一種「立憲」和一種「極端反對派」却是正常的。此刻，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像俄國這樣正在經歷着一種深刻的革命危機，同時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像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降低並庸俗化馬克思主義）採取如此懷疑和市儈的態度來對待革命的。由於事實上，革命的實質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他們便得出淺薄的結論：認為資產階級為革命的動力，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僅是從屬的，帶着非獨立的性質，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淺薄的曲解，在馬克思給顧格曼的信上是揭露的多麼好啊！這裏有一封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的信，這時候馬克思已經完成了他主要的著作。在他寫這封信的十四年前，他已經作出他對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最後的估計。一八五〇年，他否定了他自己對一八四八年行將到來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幻想。同時在一八六六年，正開始觀察新政治危機成長的時候，他寫着：

「我們的市儈們（他意思是指德國的自由資產階級）終於應該認識清楚，沒有一次推翻普魯士和荷享左倫皇族的革命……最後必定要來到另一次卅年戰爭……」

認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它是從上而不是從下發生的——馬克思預計）即將廢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樣的幻想是連影子都沒有了，信中很簡明地說着，它只能把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帝王們擺在一邊去，而他在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中是有着怎樣的信心呀！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當他理解到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有着推動的作用以後，是有着怎樣的革命的熱忱呀！

三年以後，正當法國拿破崙帝國崩潰的前夜，馬克思注意着「一種非常有意義的」社會運動，並且帶着一種積極的熱情的爆發，他說：

「巴黎人正在正視地研究着他們近代的革命往事，以準備自己從事於即將來到的新的革命事業」。

而在描寫這個研究中所顯示出來的過去的階級鬥爭情況時，馬克思結論說：

「而這樣，整個歷史的巫婆的妖鍋便都沸騰起來了，什麼時候，我們」（在德國）「可以達到這步田地啊！」

這正是俄國知識份子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學習的一課，他們爲懷疑所軟化了，被書本的虛玄陷到一種痲痺的狀態，常想作懺悔的演說，迅速地疲倦於革命，盼着革命的埋葬像是盼着假日似的，而且用立憲的散文來代替革命，他們應該向這位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和導師學習，對革命要有信心，要學得本領，以喚醒工人階級堅持自己直接的革命目標到最後，獲得精神上的堅定性，不允許因革命暫時的退潮而作出灰心失意的叫喚。

馬克思主義的書生們心想，這一切都是道德的叫喊和浪漫行爲，缺乏現實主義的知覺！不是的，紳士們，這叫作革命理論和革命政治的統一，要沒這一條，馬克思主義就變成卜能塔羅主義，司徒魯威主義和桑巴爾主義了。馬克思的學說是把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不可分離地結合成一個整體的，誰要是曲解出一套理論，把客觀的情況冷冷地說成爲目前一切都是正當合理的，同時儘速地把自己適應着革命的每個暫時退潮，儘速地丟棄「革命的幻想」，轉變成爲一個「現實主義的」修補匠，誰要是這樣，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當着最平靜的，像是「牧歌似的」（馬克思這樣稱呼），和「絕望地陷於泥濘中的」（新時代雜誌這樣稱呼）時期，馬克思却能察覺革命的到來，喚醒無產階級的自覺以從事於自己的先進的革命的任務。可是我們俄國的知識份子却像市僧似的，把馬克思庸俗化，而且在最革命的時期，教給無產階級以消極的政策，馴順地「隨波逐流」，

溫柔地支持着時髦的自由主義政黨最不穩的份子！

馬克思給公社的估計是給顧格曼的書信集中最高的光榮。這個估計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方法比較起來就愈益顯示出它的價值。普列汗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後灰心失意地叫喊着：「他們不應該動武呀！」却謙虛地把自己比着馬克思，他暗示馬克思也曾制止過一八七〇年的革命。

是的，馬克思也曾制止那次革命，可是警看，在普列汗諾夫和馬克思的比較（普列汗諾夫自己比的）中間却有着什麼樣的天淵之別呀！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革命浪潮達到它的頂點的前一個月，普列汗諾夫不但沒有有力地向俄國無產階級提出警告，相反，他用十分確定的語氣說，必須「學會用武，並動起武來」。可是一個月後，鬥爭點燃着了，普列汗諾夫不曾少微嘗試分析一下，它在一般事件進程中的意義和任務以及和它以前鬭爭形式的關聯，他便趕速担当了懺悔的知識份子的脚色，叫喊着：「他們不應該動武呀。」

一八七〇年九月，公社前六個月，馬克思有力地警告着法國工人，任何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是決死的傻事，這是他在他有名的國際的通告書中說的。他在事前提出來過民族的幻想，運動有可能帶着一七九二年的精神。他不是事後，而是幾個月前，就具有預見地說：「不要動武」。

可是當着這無望的事業（照他自己九月宣言上的說法）開始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實現的時候，馬克思又抱着什麼態度呢？是否他只是抓住機會（像普列汗諾夫於十二月事件那樣）把他的敵人「搞一下」呢，那時領導公社的正是普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是否他像一個罵人的女教員那樣說：「我給你們說過，我警告過你們，你們看看，你們的浪漫主義，你們這些革命的胡鬧搞出一個什麼玩意兒來了？」是否他對公社人員也像普列汗諾夫對十二月的戰士那樣用惡劣的市僧口吻說教：「他們不該動武呀。」

不是的，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寫了一封熱烈的信給顧

格曼——這封信我們願意每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員和每一個識字的俄國工人都在自己家裏的牆上張貼起來。

一八七〇年九月，馬克思說這個起義是決死的傻事，但到了一八七一年四月，他看見人民大眾的運動起來了，他用一個參加偉大事件的人的極大注意來看待它，那些事件標明着世界歷史革命運動向前跨進了一步。

他說，這是一種嘗試，企圖毀滅那官僚軍事的機器，而不簡單地是把它擺在別的人的手裏。同時他向那受着普魯東主義者和白朗基主義者領導的「英勇的」巴黎工人唱着真誠的「讚美歌」。

「在這些巴黎人身上該有着什麼樣的韌性」，他寫道：「什麼樣的歷史創造性，什麼樣的勇於犧牲的器量呀！……歷史上找不着同樣偉大的同樣例子。」

群眾的歷史創造性就是被馬克思估價得比一切都高的東西。啊，假如我們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員也能從馬克思身上學到領會俄國工人農民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所表現出來的歷史創造性的話！

那在六個月以前就預見失敗的深刻的思想家對群眾歷史創造性所表示的尊崇——和那無生命的，無靈魂的酸書生：「他們不該動武呀。」難道這不是有天地之隔嗎？

同時，像一個直接參加群眾鬭爭的人一樣，馬克思帶着他一切性格上所特有的熱忱和感情來響應這個鬭爭。他那時流亡在倫敦，馬上工作起來，評述那些準備「翻天」的「愚勇的」巴黎人的緊接着的步驟。

啊，我們現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的「現實主義」的聰明腳色們——他們譏諷着俄國一九〇六——〇七年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該當如何嘲笑着當時的馬克思啊！他們該當如何訕笑着那唯物主義者和經濟學者，烏托邦的敵人，他竟向那「翻天」的「嘗試」表示崇敬之意！

這些「套子裏的人們」（註）該當如何爲他流着眼淚，爲他發出謙遜的微笑和憐憫啊！因爲他那造反的傾向，烏托邦主義等等，因爲他對那翻天運動的估計！

可是馬克思並沒有這班懦夫的聰明，懦夫們生怕討論革命鬥爭更高級形式的技術。而他要討論的恰恰是暴動的技術問題。他問，防禦還是進攻？就好像軍事行動在倫敦郊外進行着一樣，同時他決定，必須是進攻：「他們必須立即向凡爾賽進軍……」

這是一八七一年四月寫的，偉大的五月的血的日子前幾個星期寫的……。

於一八七〇年九月開始決死愚蠢的翻天的事業的反叛者，「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他們不該動武」不該用武力抵抗敵人奪取人民已經取得的自由的最初嘗試……。

不，普列汗諾夫把自己和馬克思相比決不是無所謂的！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在他那技術的評論中繼續寫道，就在於「中央委員會」（軍事領導者——註，還指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放棄自己的力量太快了」。

馬克思能够事先警告領導者勿作尚未成熟的暴動。但是他對翻天的無產階級的態度却是個實際的顧問，却是個群眾鬭爭的參加者，不管白朗基和普魯東的錯誤的理論如何，群眾總把整個的運動推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縱然情況這樣」，他寫道，「目前的巴黎起義，即使被舊社會的豺狼，蠢豬，毒狗所擊破，那也是我黨巴黎六月起義後最光輝的業績……」

而馬克思，不會在無產階級面前掩飾公社所犯的任何一個錯誤，獻給這個事業一本著作，還本著作，直到今天，仍舊是爲「天國」而

註：柴霍甫小說中的主人公，不管任何天氣，他把自己包起來，同時，要是聽到誰提出自由的改革，便叫喚着：「我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情才好！」

鬭爭的最好的指南，而對自由主義者和激烈的「蠢豬」來說，却是可怕的精怪。

普列汗諾夫也獻給十二月一本「著作」，可是它已經差不多成為立憲民主黨的聖經了。

不，普列汗諾夫把自己和馬克思相比決不是無所謂的。

很顯然的，顧格曼在回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懷疑，指出事情的無望，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互相比較——至少他把公社的起義和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巴黎的和平示威來相比較。

立即，馬克思回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他寫道：

「世界歷史就真的太容易創造了，假如鬭爭只有在不可能失敗的好機會的情況下才進行的話」。

一八七〇年九月，馬克思稱起義為決死的傻事，可是當群眾起來了，馬克思願意和他們一起行進，和他們一起在鬭爭的進程中學習，而不是給他們官僚主義的訓令。他理解到，企圖事先完全準確地計算好每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騙人，或是無望的買弄虛玄。他把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犧牲地，而且自創地創造世界歷史這件事情看得比其它一切事情都高，馬克思是從那些創造歷史的人們的觀點來看待這個歷史的，他們不可能事先精確地計算好偶然的事物；他不是從那些勸善的知識份子和市儈的觀點來看待這個歷史的，他們說：「這很容易預見到……他們不應該依靠……」。

馬克思能够理解到這樣的事實，歷史有着這樣的契機，那時群眾甚至為無望的事業而決死地鬥爭着，但這是必須的，為了更進一步教育群眾，為了訓練他們自己作下一次的鬭爭。

對於我們目前類似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喜愛引錄馬克思，僅僅是為學習估計過去，而不是為提高自己的能力以改造將來——對於他們，這樣提問題的方法是不能理解的，甚至原則上是疏遠的。這點普列汗諾夫連想也不會想過，當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後開始「制

止」的時候。

可是恰恰是馬克思提出這個問題，他一點也沒有忘却，就是他自己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間把起義看作是決死的壞事。

「凡爾賽資產階級的流氓」，他寫道：「給巴黎人提出兩條路，或者是繼續戰鬥，或者放棄任何鬭爭投降，在後一種情況下，工人階級的精神頹喪，比之任何數目字的「領導者」的喪失，都將是一個遠為重大的不幸。」

那麼就用這段話來結束我們簡短的評論，它論述了一個稱得上無產階級的政策教訓，那政策是馬克思在給顧格曼信中所提出來的。

俄國無產階級已經證明了，而且還將更多次地證明，它是有能力「翻天」的。

一九〇七年二月

